

行动党参加1964年马来西亚大选及其影响

庞卫东

(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旅游管理系,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1964年3月1日是新马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日期,是新马由磨合转向全面冲突的分水岭。当日,杜进才宣布,行动党要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参加马来亚大选。虽然杜进才解释说行动党仅是象征性地参加联邦选举,然而这很明显违背了李光耀向东姑作出的郑重承诺:不参加马来亚的选举。行动党宣布参加选举导致其与联盟的关系迅速恶化,并引发了新马潜藏已久的矛盾,也使新马朝向分离迈出了重要一步。

关键词:行动党;联盟;马来亚大选;分离

中图分类号:D73.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392(2010)01—0085—05

马来亚联合邦的领导人在合并之前就认识到,必须限制新加坡的政治影响力,因此在合并时就设计了两项隔离性条款:其一,联合邦仅同意分配给新加坡15个国会议席。^①其二,根据马来西亚宪法,新加坡公民不能参加马来亚的大选,马来亚的公民也不能到新加坡从政。^{[1](P19)}作为让步,联合邦同意新加坡保留劳工和教育方面的自主权。

联合邦的目的很明确:限制新加坡在国会中的议席数,减少其在马来西亚联邦中的影响力;把行动党限制新加坡岛内,不要过问马来亚的政治。虽然新马双方领导人签署了合并协议,但他们对限制性条款的理解却是不同的,特别是在经历了1963年新加坡大选以后,双方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一、行动党参加马来亚选举的动机及争议

在行动党参加马来亚大选的问题上,李光耀的政治野心一直是被攻击的焦点。虽然,依据马来西亚宪法,每个公民都有成为部长甚至首相的权利,但李光耀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以种族认同为分野的马来西亚社会中,没有马来人的支持是不可能成为马来西亚首相的。1963年7月,李光耀曾言:“我能设想行动党和马来领导人一起工作,但我不可想象一个新加坡的政党能占据马来西亚国会……只要东姑在那里,他

就是马来西亚的领导人。”^[2]在马来西亚成立后不久,李光耀再次澄清了他在马来西亚的位置,他承认有必要让一个马来人在未来20年任马来西亚的首相。^[3]然而,就技术层面而言,非马来人成为马来西亚的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在几十年后突然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李光耀想借参加马来亚选举,开始一个潜移默化的政治影响进程。

虽然在合并前后,李光耀曾多次表示过行动党不会参加1964年的马来亚大选,但这些声明并不意味着行动党没有泛马来亚的野心,行动党从来没有认定不会把势力跨越长堤。行动党的领导人一直认为,马来亚而非新加坡才是行动党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从政党的生存和长期发展来看,如果把行动党的活动仅局限于新加坡,或仅作为新加坡的执政党是非常危险的。正如李光耀于1963年11月29日在立法会议上所言:“最终的权力归于国会,任何政党希望改变我们社会的状况都要取得对马来西亚的控制权。事实上,我们面临一个状况,如果任何政治运动想要获得改变我们社会经济结构的权力,首先就要在国会中占有大多数席位,并取得行政当局的效忠及武装力量的顺从。”^[4]

除了自身发展的需要,行动党决定参加马来亚大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来自于岛内的政治生存压力。巫统、马华、印度人国大早在1950年代都在新加坡建立了自己的分部,它们在1961年组成了新加坡

收稿日期:2009-09-13

作者简介:庞卫东(1979~),男,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旅游系教师,博士。

① 如按当时的人口与经济容量估算,新加坡至少可以分配到24个席位。

联盟,到1963年时又同新加坡人民联盟合并。实际上,联盟一直在尝试通过新加坡联盟来扩展其在新加坡的影响力,并试图左右星岛政局。尽管马来西亚宪法不允许新马两地选民跨区参加众议员选举,但却不阻止马来亚或新加坡的政党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长堤对面。联盟首先这样做了,1959年,巫统、马华及印度国大的新加坡分部参与了新加坡议会选举。此后,它们合组新加坡联盟,参加了1963年新加坡大选。尽管新加坡联盟在1963年大选中惨败,但联盟领导人计划改组它,并使其成为一个有活力的政党。在联盟主导的中央政府的强力支持下,假以时日,新加坡联盟将会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政党,能够对行动党产生足够的威胁。如果行动党仅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新加坡岛内,那它只能处于被动的防守状态。此外,在经济方面,行动党担心马华公会会长陈修信利用财政部长的身份阻碍新加坡工业化的进程,他们认为“只要马华相信它能利用部长的地位恢复其在新加坡的组织,它就会干涉新加坡事务。这种干涉不能阻止我们,但却会带来无尽的冲突。”^[5]

就政党的本质而言,作为一种政治组织,谋取国家公共权力是政党的基本目标之一。行动党既然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全国性政党,以选举的方式谋取国家政权便是其本能的诉求。实际上,政党追求权力的本能与其领导人的政治欲望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李光耀如欲成为马来西亚的首相,行动党必须在国会中占据多数议席,成为执政党。因此,行动党把支部扩展到全国,参加联邦选举便是必经之路。另一方面,政党发展壮大,成为执政党,其领导人也将随之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当时李光耀在行动党中的地位而言,如果行动党成为执政党,李光耀必然成为首相。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讲,行动党参加联邦选举,是以上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对于参加联邦选举,行动党内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拉惹勒南、杜进才和王邦文等人积极主张参加联邦选举,希望借机把行动党扩展成一个全国性政党。以吴庆瑞为首的一批人则反对介入马来亚大陆的选举,他认为行动党一旦参加竞选,将会导致吉隆坡和新加坡之间关系恶化,致使他的工业化计划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另一个中央执委李炯才从技术层面上提出了反对意见,由于行动党在马来亚没有分支也没有资金,他估计赢得大选非常困难。^{[6] (P75)} 李光耀对参加选举一事,犹豫不决。早在1963年9月9日,李光耀曾宣布人民行动党不参加1964年的马来亚大选,因为他要向马来亚华人公会表明,“即使人民行动党不参加马来亚本土的大选,马来亚华人公会仍然会落选。”^[7] 然而,鉴于其他中央执行委员的反对,以及马来亚联盟介入了新加坡的选举,李光耀显然不愿遵守之前的承诺,他认为“巫统不打算让新加坡像双方先前同意那样,自己管理内部的事

务。这样一来我们需要更早投入马来亚的政治,以便维护我们的利益。”^{[8] (P562)}

参加联邦选举事关重大,行动党内部对此曾做出过严肃的考虑。在李光耀动身访问非洲前夕,行动党宣传协调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在吉隆坡维护新加坡的利益,会议重点讨论了行动党参加马来亚大选之事。作为委员会主席,李光耀要求委员会全面评估参加马来西亚大选的利弊得失,并要求必须等其从非洲回来之后才能做出决定。然而,行动党内的激进派并没有听从李光耀的建议。在李光耀访问非洲期间,拉惹勒南、杜进才和王邦文——这三名在马来亚出生和长大的行动党部长,说服了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他成员,以投票的方式通过了参加联邦大选的决议。当李光耀返回新加坡时,面对的已经是一个既成事实,他遂决定遵守行动党中委会的决议。

1964年3月1日,人民行动党主席杜进才宣布,行动党将参加联邦选举,但是他强调说,“我们参加大选的目的是为了同巫统及中央政府合作,以协助促进马来西亚的成功……我们仅扮演象征性的竞选者。”^[9]

二、竞选宣传与斗争

1964年3月11日,人民行动党在马来亚获准注册,并在吉隆坡设置了选举总部,杜进才率领三名部长亲赴马来亚,安排选举事宜,竞选宣传工作迅速展开。3月19日,行动党公布了竞选宣言。在竞选宣言中,人民行动党提出:1. 在非共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团结、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马来西亚。2. 推动马来西亚的社会经济改革。3. 打击社阵,取代马华。^[10] 人民行动党提名了11个国会候选人。为了表明不与巫统为敌,当发现它的候选人中有两个与巫统的候选人存在竞争时,行动党的候选人就退出了这两个选区,实际只是竞争九个席位。

行动党参加马来亚大选,使巫统和东姑深感不安。3月2日,联盟选举委员会主任洗鲁(Senu Bin Abdul Rahman)呼吁联盟全部党员保持镇定,沉着应对任何挑战。洗鲁指出,行动党在新加坡获得压倒性的胜利,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可以在马来亚获得同样的成绩。^[11] 行动党的参选使东姑非常恼怒,在东姑看来,李光耀不仅是背信弃义,更重要的是要增加新加坡在国会中的发言权。行动党对马华的攻击也引起了东姑的不满,东姑明确表示,巫统将与马华站在一起,联盟以整体参加竞选,并称:“就算马华公会只有五个人,我们还是接受它为一个政治伙伴,但我们不接受其他朋友。”^[12] 与此同时,东姑宣布暂缓李光耀代表马来西亚访问美国的计划。此外,联邦选举委员会主席Haji Maustapha Albakri宣布,任何非联合邦公民参与选举活动都将是违法的。此举旨在阻碍本身

为新加坡公民的行动党人士协助其候选人拉票和竞选宣传。^[13]然而,这个说法显然是难以成立的,因为东姑及陈修信等人身为联合邦公民,都曾介入了1963年的新加坡选举。在行动党的抗议下,经过马来西亚司法部的裁夺,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于3月19日发表声明,新加坡公民可以协助国州选举竞选工作。^[14]

随着竞选活动的迅速展开,竞选斗争也更加激烈。由于人民行动党刻意避开与马来候选人竞争,因此人民行动党的主要对手是马华公会。实际上,人民行动党和马华的冲突在合并之前就已经开始,李光耀与东姑在伦敦谈判时建议,由人民行动党代替马华而成新加坡联盟的一员,遭到了东姑的拒绝。^[15]马来西亚成立后,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平息,相互诋难之词时常见于报端。人民行动党宣布参加马来西亚大选,并明确提出取代马华以后,双方的矛盾更趋激化。

马华与行动党都非常重视此次选举,在竞选宣传过程中,双方唇枪舌战,相互指责。从斗争的形势上讲,马华显然处于优势一方。首先,马华积极巩固与巫统的关系,在政治上甘居其次,赢得了巫统的全力支持。其次,马华不仅可以进攻行动党,而且能够轻易地把行动党的攻击转移给巫统。虽然行动党尽量避免与巫统发生冲突,但巫统依然把其当成主要对手。面对巫统的批评与指责,行动党只能处于被动的防守状态,而无法发起进攻。

如果说与马华相比,行动党仍有一些优势的话,其优势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行动党拥有一支高效的竞选队伍和丰富的选举经验。在一个多月的竞选宣传中,李光耀等一批行动党领导人,乘车奔波于马来亚各地,到行动党候选人竞选的市镇,召开群众大会。行动党的群众大会相当成功,每次大会都吸引了大批的群众。其二,行动党的社会改革理论吸引了相当一部分年青人的注意力。3月22日夜,行动党在吉隆坡苏莱曼广场上召开群众大会。李光耀在会上强调,如果行动党的九名候选人全部中选,势必引发一场社会革命,它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当选的人数。李光耀套用了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名言,“如果你们明确地表示支持一个诚实的政党,一个采取生气勃勃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政党,那么社会改革将遍及整个马来西亚。”李光耀强调,如果巫统领袖希望得到市镇选民的支持,就必须调整政策,考虑到人民的愿望。^{[8](p600)}

李光耀的社会改革理论显然令保守且具有种族性的巫统深为不安。巫统认为行动党的社会改革理论是对马来权力基础的潜在威胁。尽管行动党称此次仅是象征性地参加大选,但在巫统看来行动党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正在迅速崛起,是一个危险的敌人。3月23日,在苏莱曼广场召开的巫统群众大会上,拉扎克称马来亚不需要李光耀的社会革命,而需要社会进化……需要一种柔缓的(*Soft and Light-hearted*)社会

改革。^[16]3月25日,赛加化阿峇质问李光耀,他的社会改革理论是否最终导致废黜苏丹,把橡胶园和锡矿收归国有。^[17]

另一个令巫统难以接受的宣传是行动党以城市居民的代言人自居。行动党把自己装扮成城市利益的捍卫者,并巧妙地使用两分法,把马来社会分成城市与农村两部分,把巫统的形象设计成农村利益的保护者。^{[18](p190)}3月24日,李光耀在槟城发表演讲:“国家的命运不取决于个人的好恶,取决于基本的政治因素,无论我喜欢东姑或东姑喜欢我与否,东姑代表了农村马来人。在建设一个繁荣的马来西亚过程中,我们能够提供很好的帮助。如果马华不能在城镇担负起它的责任,摆在巫统面前的选择只有自己单独去管理或与有能力的党达成妥协。”^[19]这无疑是说明,巫统没有能力管理城市事务,必须求助于行动党。这种说法自然引起了巫统的极大不满,拉扎克谴责行动党在城市人民与农村人民之间实施离间政策,“这种做法使人民以为联盟政府已经忽略了市区人民的需要……以行动党目前的表现来看,行动党是在强迫巫统与之合作。”^[20]很明显,巫统愿意接受的只是一个顺从的城市政党,而非具有挑战性的行动党。

在这次大选中,参加竞选的除联盟、行动党、社阵和泛马回教党外,还有人民进步党和民主联合党。行动党与联盟的宣传斗争虽然非常激烈,但行动党仅派出9名候选人参加国会选举,难以对联盟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人民进步党和民主联合党分别以霹雳和檳城为主攻对象,实际上是一种地方性政党。并且两党都难以提出有吸引力的动员理论和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政党领导人的个人威望来赢得选民的支持。因此,在这次选举中,社阵、回教党和联盟构成了竞争主角,但社阵的候选人主要集中于城市市区,回教党的候选人主攻丁加奴及吉兰丹两州,联盟的候选人则是遍布整个半岛,因而在大选之前,局势已定。

三、选举结果及其原因分析

1964年4月26日,马来西亚大选揭晓,联盟大获全胜。在国会竞选中,联盟获得89席,比上一届多出15席,其中巫统获得59席、马华27席(上届马华为19席),印度国大3席。在州议会选举中,联盟获得了240席,比1959年大选多出75个席位,除吉兰丹州被泛马回教党主政外,其余10个州尽入联盟囊中。人民行动党在此次选举中可谓惨败,25个候选人中仅有1人当选。更令行动党难以接受的是,行动党有6个国会候选人及8个州议会候选人因得票不足8%,而被没收了选举保证金。国会大选的详细结果见下表:

1964 年马来亚大选情况表

政 党	竞选席位	当选席位	竞选席位的 有效选票总数	得票总数	竞选席位的 得票百分比	有效票总数的 百分比
联 盟	104	89	2,057,504	1,204,340	58.5	58.5
社 阵	63	2	1,334,408	330,898	24.8	16.1
回教党	53	9	1,028,214	301,187	29.3	14.6
人民进步党	9	2	207,916	69,898	33.6	3.4
统一民主党	27	1	578,096	88,223	15.3	4.3
人民行动党	11	1	258,212	42,130	16.3	2.0
国 家 党	4	—	69,884	7,319	10.5	0.4
中 间 派	8	—	104,805	13,509	12.9	0.7
共 计	279	104	—	2,057,504	—	100.0

资料来源：冯清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它的历史、组织和领导[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P155.

面对选举的惨败，行动党领导人不得不进行了反思，李光耀把行动党的失败归结为三点：

首先，行动党在马来亚的群众基础非常薄弱。由于行动党此前没有在马来亚本土设立党支部，行动党必须把工作人员从新加坡调到马来亚。这些工作人员当中，虽然有不少是在马来亚出生和长大，但是他们同当地的基层缺乏充分的沟通，以致难以取得选民的信任。

其次，行动党缺乏在联邦竞选游说经验，并且竞选成本远高于新加坡。在新加坡，工作人员都是自愿为行动党效劳，行动党的标语布条，也往往是支持者捐献的。但是在联邦，每一样东西都需要花钱购买，包括帮助行动党粘贴标语的工作人员，都要付给酬劳。到竞选结束时，行动党已经负债6万余元。

第三，行动党只是象征性地参加联邦选举，无法向选民提出更具吸引力的口号，让他们把投给马华的选票改投给行动党。李光耀也不得不承认“他们（选民）要同巫统领导的政府保持联系。这个政府负责发放给他们所需要的执照。如果我们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并改变他们的投票习惯，我们就得派出人数足够多的候选人参加竞选，以取得他们的信任，同时使他们觉得支持我们有一定的好处，希望我们有一天实力能够强大，足以跟巫统讨价还价。”^[8]（P603-604）

李光耀的看法确实反映出了行动党存在的问题，但除以上三点以外，行动党的失败还有其他原因。

其一，联盟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华、巫、印三个主要族群的利益，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并且自1951年以来，在联盟的领导下，马来亚先后实现了自治和独立，并且基本上平定了马共的叛乱，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在经济方面，马来亚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可以说联盟执政期间，政绩斐然，其再次获胜有一定的必然性。

其二，与印尼对抗的紧张国际环境也是联盟取胜的重要因素。对抗给了联盟一个测试人民忠诚的机会，拉扎克警告群众，选民正面临着一场独立还是被统治的抉择，投联盟的票即是支持马来西亚，投反对党的票无疑是投给苏加诺。^[21]

其三，行动党对马华实力的估计，严重失误。行动党认为马华在城市已经失去群众基础，并且相信马华垮台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行动党群众大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使其领导人盲目乐观地预测他们将得到广大华人及部分城市马来人的支持。实际上，马华当时仍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政党。首先，马华公会成立后，在安置“新村”华人、争取华人公民权及维护和发展华文教育等方面，做了许多实事，在华人社会中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其次，马华公会在马来亚会员众多，组织健全，且得到了华人社团及企业的支持，经济实力雄厚。再次，马华公会内部经历激烈的争权斗争后，林苍佑派被彻底清理出局，马华内部相对比较团结。1963年底到1964年初，马华内部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旨在树立马华年青和充满活力的形象。领导人也急切地希望消除华人对他们自私和脱离民众的看法。^[22]（P416）在选举前，马华领导人马不停蹄地访问华人选区，许诺在经济上给华人以支持，比如，马华青年团3月13日在甲洞许下诺言，如获居民继续支持，将为当地兴建一所中学。^[23]对于广大华人而言，这种实际利益远比行动党空洞的社会理论更有吸引力。

其四，行动党的失败与联盟充分的选举准备也是密不可分的。联盟对此次选举非常重视，鉴于在新加坡大选中仓促应战的教训，联盟于1963年底便召回马来西亚驻西德大使洗鲁，任命其为选举委员会主任，负责此次大选的全面工作。为了便于协调，洗鲁将选举委员会设在了吉隆坡的联盟总部，同时花巨资购买了49辆日本汽车，构建了一个高效的交通网络。^[24]（P43）巫统秘书长赛加化阿峇亦积极指挥各地巫统分支机构，全力投入竞选工作之中。选举提名日过后，东姑拉曼便让拉扎克代理其首相职务，而自己则开始遍访全国选区，亲自从事竞选宣传。

四、大选对新马关系的影响

虽然人民行动党在此次大选中成绩不佳，但对马来西亚政治的影响却非常大。大选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导致

新马关系急速恶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行动党参加竞选的合理性及介入马来亚政治的理由(如联盟需要行动党的帮助),都受到了严重的质疑。马华不仅挫败了行动党的挑战,而且赢得了更大的成功。它赢得了所竞选的33个国会席位中的27个,胜率为82%,远高于1959年的61%。巫统获得了43%的选民支持,加上马华的票数,其支持率达到67%,成为国会中最大的赢家。^{[25] (P123)} 大选期间,行动党与马华的矛盾激化,双方势同水火。此后,以陈修信为首的马华一直是攻击人民行动党的先锋。虽然,部分华人对马华公会甘居巫统之下的政策表示不满,但行动党在此次选举中的惨败,使华人看不到马来西亚权力结构重组的希望,因此大部分华人仍不得不选择支持马华公会,使得人民行动党在马来亚很难得到华人的支持。

其次,行动党与巫统的关系出现重大裂隙。行动党的领导人不希望行动党被巫统认为是一个有野心的政党,一个对马来人利益产生威胁的政党。而事实上,行动党参加1964年的马来亚选举,不但被巫统认为是政治上的敌人,而且被整个马来社区视为敌人。行动党参加选举的主要目标是在选举中挫败马华公会,使巫统看到,只有行动党才是唯一的合作伙伴。但行动党所采取的赞扬巫统羞辱马华的做法却被巫统认为是企图离间联盟内部关系。

第三,这次选举改变了行动党在政府中的地位。在此之前,行动党被政府看成是介于朋友与敌人之间的中立派,它的5个部长坐在政府的一面,7个党员坐在反对席上。选举过后,行动党被政府视为彻底的政治敌人,其所有成员都被移到了反对党的席位上。更为糟糕的是,行动党的挑战失败,使其不得不面对联盟政府的报复。联盟在国会中占据主导力量,单马来亚联盟就拥有89个席位,已占据了国会议席的绝对多数,再加上婆罗洲联盟的35席,联盟的总席位已达124席,比2/3还多20席,这使得政府能够顺利通过其提出的方案及宪法修正案。现在,联盟政府可以更有效地对付新加坡。

此外,大选还导致李光耀与东姑的个人关系破裂。李光耀违背诺言,参加大选已经使东姑感到不满。李光耀在居銮发表的不谨慎演讲,^①更令东姑心痛不已。在行动党宣布参加马来亚选举之前,东姑对李光耀比较欣赏,一度决定派李率代表团出使联合国,甚至还考虑让李光耀或林金山等行动党领导人加入内阁。大选过后,东姑认为李光耀是一个不守信

用,且很难应付政治投机家。至1964年底,东姑甚至不愿与李光耀直接谈判,而宁愿与吴庆瑞、林金山等行动党内的温和派会谈。虽然,新马关系并非完全由领导人的个人好恶所决定,然而当时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权体系中,东姑和李光耀显然在各自的政府中居于主导地位。李光耀与东姑个人关系的恶化,无疑会对新马关系产生极为不良的负面影响。

参考文献:

- [1] Malaysia Federal Constitution (1963) [Z]. Article 30A.
- [2] The Straits Times. 1963-06-31.
- [3] The Straits Times. 1963-09-29.
- [4] Singapore Legislative Assembly Debates [Z]. 29 November 1963. Vol. 141.
- [5] The Straits Times. 1964-04-18.
- [6] Lee Khoo Choy, On the Beat to the Hustings: An Autobiography [M]. Singapore: Times Books International, 1988.
- [7] The Straits Times. 1963-09-10.
- [8] 李光耀. 李光耀回忆录:1923-1965 [N]. 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
- [9] The Straits Times. 1964-03-02.
- [10] 南洋商报. 1963-03-27.
- [11] 南洋商报. 1964-03-3.
- [12] 南洋商报. 1964-03-15.
- [13] The Malayan Times. 1964-03-19.
- [14] 南洋商报. 1964-03-20.
- [15] 南洋商报. 1963-09-11.
- [16] The Straits Times. 1964-03-124.
- [17] The Straits Times. 1964-03-26.
- [18] Mohamed Noordin Sopiee, From Malayan Union to Singapore Separation [M]. Kuala Lumpur: Penterit University Malaya, 1976.
- [19] The Straits Times, 25 March 1964.
- [20] 南洋商报. 1964-04-13.
- [21] 南洋商报. 1964-04-06.
- [22] K. J. Ratnam and R. S. Milne, The Malayan Parliamentary Election of 1964 [M].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 [23] 南洋商报. 1964-03-15.
- [24] Patrick Keith. Ousted [M]. Singapore: Media Masters Pte Ltd, 2005.
- [25] Albert Lau. A Moment of Anguish: Singapore in Malaysia and the Politics of Disengagement [M].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1998.

[责任编辑:杨文松]

① 李光耀在居銮用华语发表演讲时,指出东姑的问题有一半是其老朋友造成的,“……他们很巧妙和自私地利用东姑和他们之间的个人关系。要使本邦不受伤害,我们就必须从陈东海、许启谟、林有福之流手中救出东姑。”东姑认为这是在讥讽他幼稚,没有能力领导这个国家。尽管李光耀为此做了辩解,却难以平息东姑的愤怒。